



运河本身是一种物化的文化现象,但同时它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。就主流文化而言,它造就了文风昌盛,学术繁荣,就非主流文化而言,它促进了市民文学发展,民间艺术传播,民间信仰多样化及区域文化的交流。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,山东运河留下大量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,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沧桑。

一部《金瓶梅》半是运河景 “苏禄王墓”见证中外交流 文化视野中的山东运河

□李泉

运河通,书院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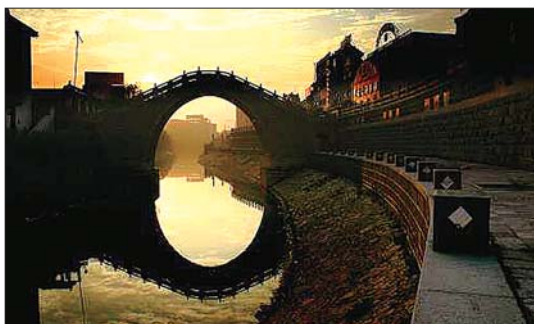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,也是古代文化教育最发达的区域,历代书院兴盛便是明证之一。元代以后,山东境内书院数量有明显增加,好多著名书院如洙泗书院、泰山书院、尼山书院等,大都在运河流域。明朝中期以后山东书院发展更为迅速,新建书院达八十七所,修复前代书院九所,其中有四十二所在运河流域。明朝后期,鲁西地区书院纷纷建立,正是运河交通带动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。据统计,清代山东书院达213所,有86所分布在沿运河地区。书院数量多,既是运河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,也是文化兴盛的表现。

谈起产生于运河区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,人们首先会想到《金瓶梅》。其作者“兰陵笑笑生”到底是谁,学界目前已考证出百人之多,但究竟是谁,仍旧莫衷一是。不过所论及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或生活在运河区域这一点是肯定的。《金瓶梅》内容更是与运河密切相关:书中展示了临清城市的繁华,可与当时其他书籍相印证;七八十处对临清景物的描述,在临清地方志中大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记述;特别是对临清钞关、娱乐业、服务业、运输业的描绘,更说明作者对临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。通俗小说是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市民文学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工商业繁荣,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。明清运河畅通,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,通俗小说的出现适应了这样的需求,而《金瓶梅》显然是其中的代表。

运河带来民间信仰多元化

明朝开始,佛教和道教在山东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,并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,而杂糅三教教义的民间宗教蓬勃兴起。随着大运河区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逐日增强,许多异地神祇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,融入了本地社会生活,使这个区域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出现多元化特点。

明代以前,山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以白莲教、弥勒教及摩尼教为主。明代中期新教派开始出现,它们在教义、组织、仪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教派有明显差异。成化年间,“无为教”在山东运河区域广泛传播,进入清代,各种名目的教派层出不穷,八卦教、清水教、天理教、离卦教、圆顿教,在理教、罗教、弘阳教、闻香教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出现。明朝以前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,除官府提倡的城隍、土地诸神之外,还有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信仰。明朝大运河贯通后,民间信仰的对象,有水神、行业神、自然神,还有圣贤神,数量与日俱增。其中以金龙四大王为代表的



运河边的城镇。

关公信仰最为普遍,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。

苏禄王墓见证中外交流

明成祖建都北京后,鼓励海外国家来京朝贡。这时,京杭运河全线畅通,前来朝贡的诸国使者,大都从东南沿海登岸,沿运河乘船北上,到达北京。在山东运河沿线,常年可见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船只靠岸销货购物,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特产出售。

在大运河岸边的德州市郊,有一座明代外国国王的陵墓——苏禄王墓,它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使团沿大运河往来的见证。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,永乐十五年(1417)八月,苏禄国王率领军属,随同三百四十余人来北京朝贡。九月,使团沿运河南下回国。行至德州,东王病逝。明成祖闻讯,赐谥号“恭定”,按诸侯王葬制为其修建陵墓。按照中国礼俗,明成祖让苏禄东王的长子回国继承王位,次子安都禄、三子温哈刺及王妃,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,守墓三年。三年过后,苏禄王的两个儿子及王妃等不愿离去,后获准定居德州,长期为苏禄王守墓。他们死后也都葬在了苏禄王坟墓旁。按照中国的姓氏习俗,安都禄的后裔改姓安,温哈刺的后裔改姓温,苏禄王陵墓附近逐渐形成了安、温二姓居住的村庄。

明代日本与中国间的朝贡贸易很发达,这种贸易要经过朝廷批准,发给许可证明“勘合金牌”,所以也称勘合贸易。据《漂海录》记载,弘治年间,崔溥等人从宁波沿运河乘船北上,路过济宁以南的鲁桥镇时,岸边民众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,所以用日语向他们打招呼。可见当时来往于山东运河沿线的日本人甚多。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曾经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,在他的“游记”中,记录了很多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及运河区域的风土人情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南京乘船去北京,曾在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、济宁逗留,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中也有不少山东运河城市的记载。西方人在运河区域的活动,传播了西



大运河山东段上的船只。(资料片)

方宗教和价值观念,但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,客观上对运河区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桥闸、会馆等文化遗迹灿若星辰

千百年来,在运河开挖、修治、管理和使用过程中,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,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,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山东运河开挖维护难度大,工程多,投入的管理人员多,商业发达,城市密集,因此文化遗产最为丰厚。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,存世数百年的会通河河道堤防至今仍纵贯鲁西大地,黄河以南济宁、枣庄境内的运河,经改造后仍流淌不息,船只南来北往;黄河以北的河道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,但许多地方仍保留完好,成为珍贵的明清文化遗存。

建于成化年间的聊城北土桥闸,2010年进行了全面发掘,是目前大运河上被完整发掘的第一座船闸,2011年被评为全国文物考古十大新发现;张秋镇附近的荆门上下闸,经过文物部门的修复,也基本恢复了明清时期的原貌;临清钞关虽已残破不堪,但尚存仪门、正堂、穿厅、舍房近八十间,弥足珍贵;聊城山陕会馆是全国保持最完好、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之一;南旺汶河入运水口处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,经维修后也成为重要的运河文化景点;济宁古运河畔雄伟壮观的大白楼,曾让多少来往于运河的文人墨客驻足吟咏;济宁以南的南四湖区,运河文化遗产更丰富;因元代建南阳闸而得名的南阳镇,居湖中岛上,庄严古朴的风格至今犹存;微山岛附近的水上人家,还保留着传统的节庆仪式和生活习俗;恢复重建的台儿庄古城,处处都可以看到运河文化的印痕……这些密如繁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,深深地嵌在古老的运河上,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磨砺,而今更加炫目生辉。

(作者系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)

◆刊前絮语

一河流千年

□徐静

“大运河”是世界上最长、最古老的人工水道,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流通和对领土的统一管辖,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、决心和勇气,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。”22日,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我国的“大运河”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这样的一条河,再次被拉到聚光灯下,它以它固有的价值,被推到了世界申遗的前台,并且在这个夏天,成功地让人们关注的,不再只有“世界杯”。申遗成功,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大运河的全部价值,但却是对它的一种极高肯定。

人文齐鲁从3月22日推出“运河文化拾萃”专栏之后,已陆续发表了十余篇有关山东运河历史文化的稿件,作为编辑的我也从中慢慢体味到淹没在汤汤运河水之中的人文精华。京杭大运河如同一条流动的文化长廊,串联起了张秋、临清、魏家湾等历史文化名地,也会集了林则徐、郭守敬等诸多治河有功的历史名人;明清两朝,山东运河区域高中状元者竟达12人,几乎占据了同期整个山东省的半壁河山;清代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之一杨氏“海源阁”就设立在运河沿线的聊城。走近桨声帆影的大运河,您会发现,这是一次厚重的缅怀之旅,一次浪漫的追寻之旅,一次经典的文化交流之旅。

山东运河贯通至今已历七百余年,在运河申遗成功的今天,人们也许会问,在这漫长的岁月长河中,被视为京杭大运河瓶颈的山东运河都经历了哪些变化?我们能够“看见”的最早的山东运河是啥模样?看过B2版上的《谢肇淛,首个为山东运河立传的北河郎中》一文您就知道,要回答这类问题,唯一的途径便是农耕时代先人们留给我们的文献,而最早全面记述山东运河的文献是明代万历年间的《北河纪》,是在山东运河经历了三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之后,由一位名叫谢肇淛的北河郎中写成的。

运河两岸的城镇,很多因运河而兴,又随运河而被历史淡忘,张秋完全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的城镇,在明清五百年间经历了兴盛与繁华,最后又因传统漕运改变,运河淤塞而衰败,这种依靠单一外界条件的崛起,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,一旦改变就会陷入困顿与挫折,而今天张秋古镇的重新规划,也让我们对它的未来充满了憧憬。正如《曾与苏杭齐名的运河名镇张秋》一文的作者郑明德教授所说,运河申遗9年终于成功,这既是结束,也是开始。对于这么多年努力的国人来说,是一个回报与收获。与此同时,步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的中国大运河,更需要我们的关注与保护。

●人文齐鲁,寻觅的是过去,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;挖掘的是人文,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。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,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,那么,请联系我们吧!

●稿件请发至:qlwbxujing@sina.com